

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

阮元的一幅隸書七言聯

姚靈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所藏的清阮元贈予著名經學家焦循的「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一聯與阮元常見的隸書風格有所不同，本文擬探討此聯的內容、撰寫時間及該聯在阮元隸書實踐中可能具有的地位。

故宮藏有清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贈予著名經學家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〇）的一幅隸書七言聯，聯文內容為：「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上款為「里堂老姊丈」，下款為「愚弟阮元贈句并書」，鈐印：「芸臺」、「阮元私印」。（圖一）

阮元在他的一系列書論與訪碑筆記中對漢隸推崇備至，自身也頗為擅長書寫隸書，有許多隸書作品傳世。此聯的書寫風格在阮元的傳世隸書作品中顯得較為特別，

他的隸書作品有許多為工整一路，用筆相對嚴謹周到（圖二），同時亦有一些帶較多率意之筆的隸書傳世（圖三），但如這幅作品一般大量使用「刷筆」、顯示出禿毫效果、多處出現用筆率意所造成的線條波動變化的隸書，尚不多見。

此聯是否為阮元草草應酬之作？

此聯的贈予對象「里堂老姊丈」為阮元之至交焦循。焦循字理堂、或作里堂，

為清代著名經學家，娶阮元族姐為妻，與阮元自幼相識、切磋學問。在阮元督學山東、浙江之時，焦循曾在幕中襄助，參與處理諸多政事。阮元丁艱在籍之時，兩人更是時相過從，探討治學心得。兩人的密切情誼實為乾嘉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從焦循去世後阮元所作的《通儒揚州焦君傳》中可看出，兩人情誼深厚，且阮元對焦循之學術成就十分敬佩。

由款識可知，此聯聯句是阮元為焦循而撰，不難看出其意在以「劉光伯」、「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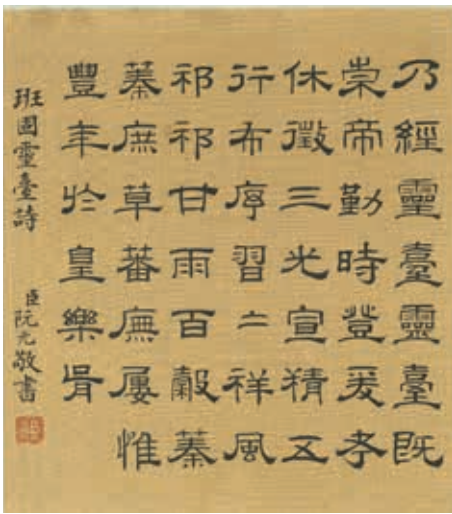


圖2 清 阮元 書歷朝名人雜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如圭」二位前賢比擬焦循的經學成就。劉炫（五四六～六一三）字光伯，隋代大儒，諸經兼治，自稱：「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註一）《隋書·儒林傳》稱其「學貫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其治學博通之理路與乾嘉漢學學者頗相契合，阮元在其經學著作中曾多次徵引過劉炫的見解。

李如圭（生卒不詳），南宋紹熙四年（一一九三）進士，字寶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其撰有《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若說阮元在上聯中稱讚焦循遍治群經，則下聯意在以李如圭比擬焦循之禮學成就。在探討宮室禮制、繪製禮圖方面，李如圭的《儀禮釋宮》為清人重要之參考書目，而焦循有《群經宮室圖》之作，以圖解說宮室禮制，確為「三禮皆圖」。因此，下聯內容實為阮元針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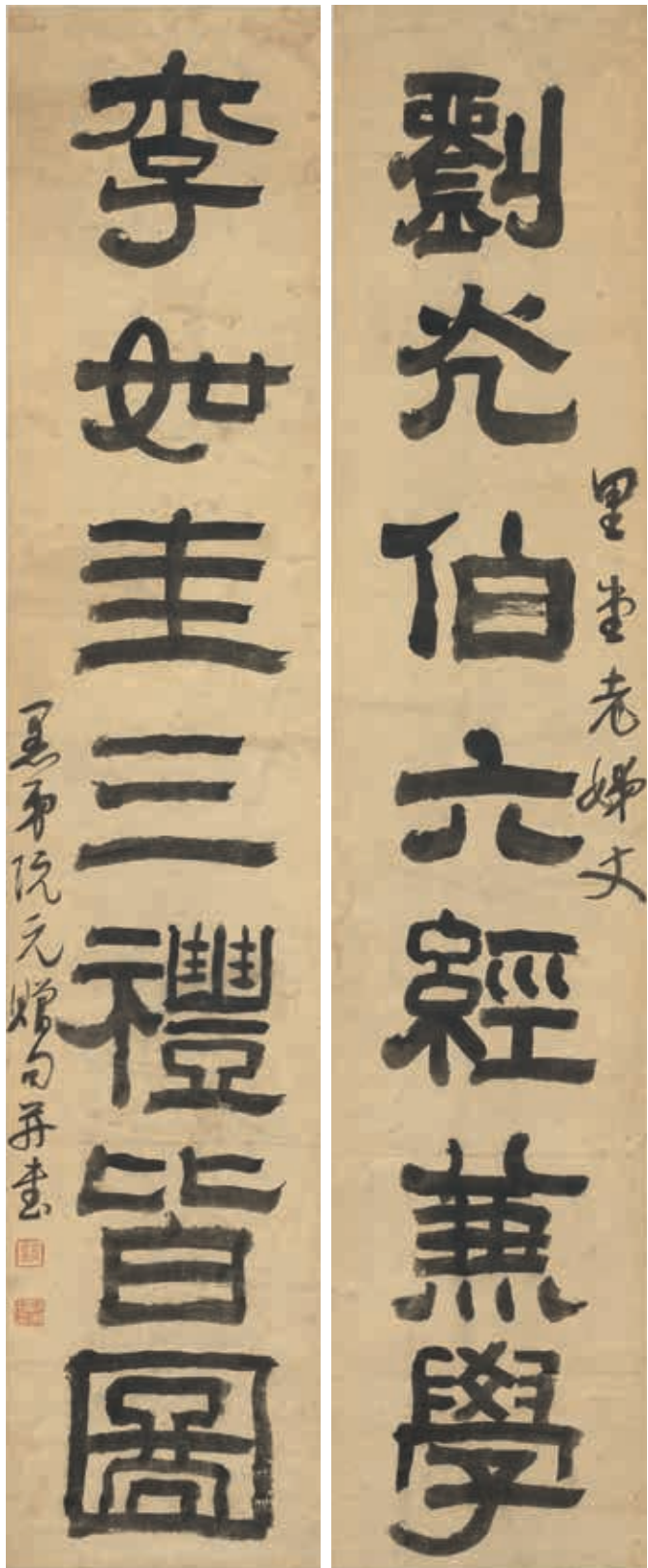


圖1 清 阮元 隸書七言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阮元 書乾隆御製南苑雙柳樹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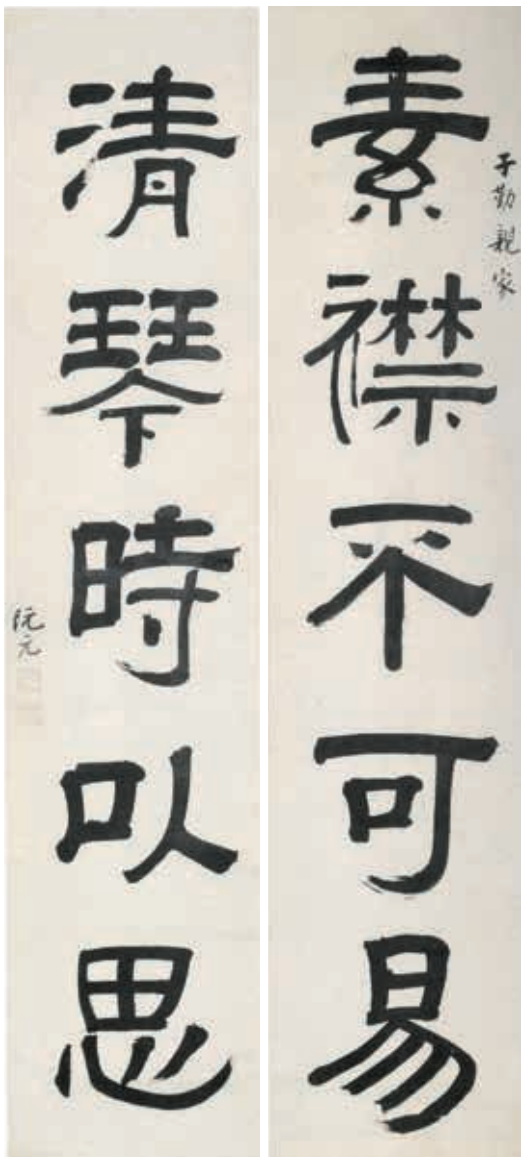


圖3 清 阮元 隸書五言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金丹，《阮元書學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2。

焦循的具體經學著作而撰寫，並非虛指。既然聯文為精心撰寫，焦循與阮元又為至交，此聯自然不會是阮元草草應酬之作。

此聯撰於何時？

此聯並無年款，但從聯文內容來看，可大致推測出此聯的撰寫年代。從二人的生卒年份來看，焦循生於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卒於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阮元生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卒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因而此

聯必然撰於焦循去世之前，即阮元五十七歲之前。焦循大約於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前後致力於《群經宮室圖》的撰寫，阮元於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六月與十一月分別致函焦循關心《群經宮室圖》的成書（註二），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阮元為此書撰寫了《焦里堂焦循群經宮室圖序》。

焦循自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後歸家著述，閉門不出，專心治《易》，最終取得極大成就，他在經學史上的盛名最終來自其易學及孟學造詣。阮元於嘉慶十六年（一八一六）為焦循所作之《寄題焦里堂

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兼示琥甥》的詩作中寫道：「密室括圖書，先生獨注易，妙司契天元，數如正負積」（註三），未再提及禮學。焦循去世後，阮元在《通儒揚州焦君傳》中長篇稱讚了焦循的易學、孟學等成就，於禮圖僅提及一句。

由此可見，阮元最可能撰聯稱讚焦循禮學成就的時間，在焦循《群經宮室圖》成書之後、易學成就突出之前，大略言之，即阮元三十歲至五十歲之間。

此聯的撰聯時間與書寫時間是否一致？由常理推之，此聯撰與寫之時間當不會間隔太遠，畢竟此聯帶有特定款識，是為贈送給特定對象而作。

阮元中年時期的隸書面貌

目前常見的阮元三十歲至五十歲的隸書多為工整面目。如阮元三十歲前後所書的《乾隆御製南苑雙柳樹賦》（圖四）為其應詔而作，書寫工穩，勻整端莊，實為隸書中之「館閣體」。他所書寫的《御製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亦為同一風格。此時阮元的日常應酬作品雖與應詔書寫有所區別，亦常寫得小心謹慎，力求周到，

如「白沙翠竹霜筠古，黃海蒼松壽節高」一聯。（圖五）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阮元的隸書作品有他人代筆者，如在浙江巡撫上任（四十歲前後）時，錢泳便會替阮元書寫碑銘、題跋、應付筆墨索請。立於浙江紹興之《大禹陵廟碑》（圖六）雖題為「阮元撰並書」，而實為錢泳代筆。此碑書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阮元時任浙江巡撫，三十八歲。此碑之代筆事宜有錢泳《寫經樓金石目》中的記載為據（註四），而觀其書風，亦為典型之錢泳書風，與阮元書風不同。錢泳字立群，號梅溪，生於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卒於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雖於科舉功名上無有成就，但書藝精熟，隸書在當時尤有名聲。阮元此時雖有一定之隸書功底，但在結體用筆等項上遠不及錢泳精嚴，因而在需要以官員身份書寫隸書的場合，他便求助於錢泳。在一封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給錢泳的信中，阮元寫道：「拙書不但工，並不能橫平豎直，務乞大筆大加潤色規正之，庶不有傷妙刻面目也。再有焦山仰止軒記，奉乞大筆作隸，以便刻石。」（註五），可見阮元此時對於自己的隸書並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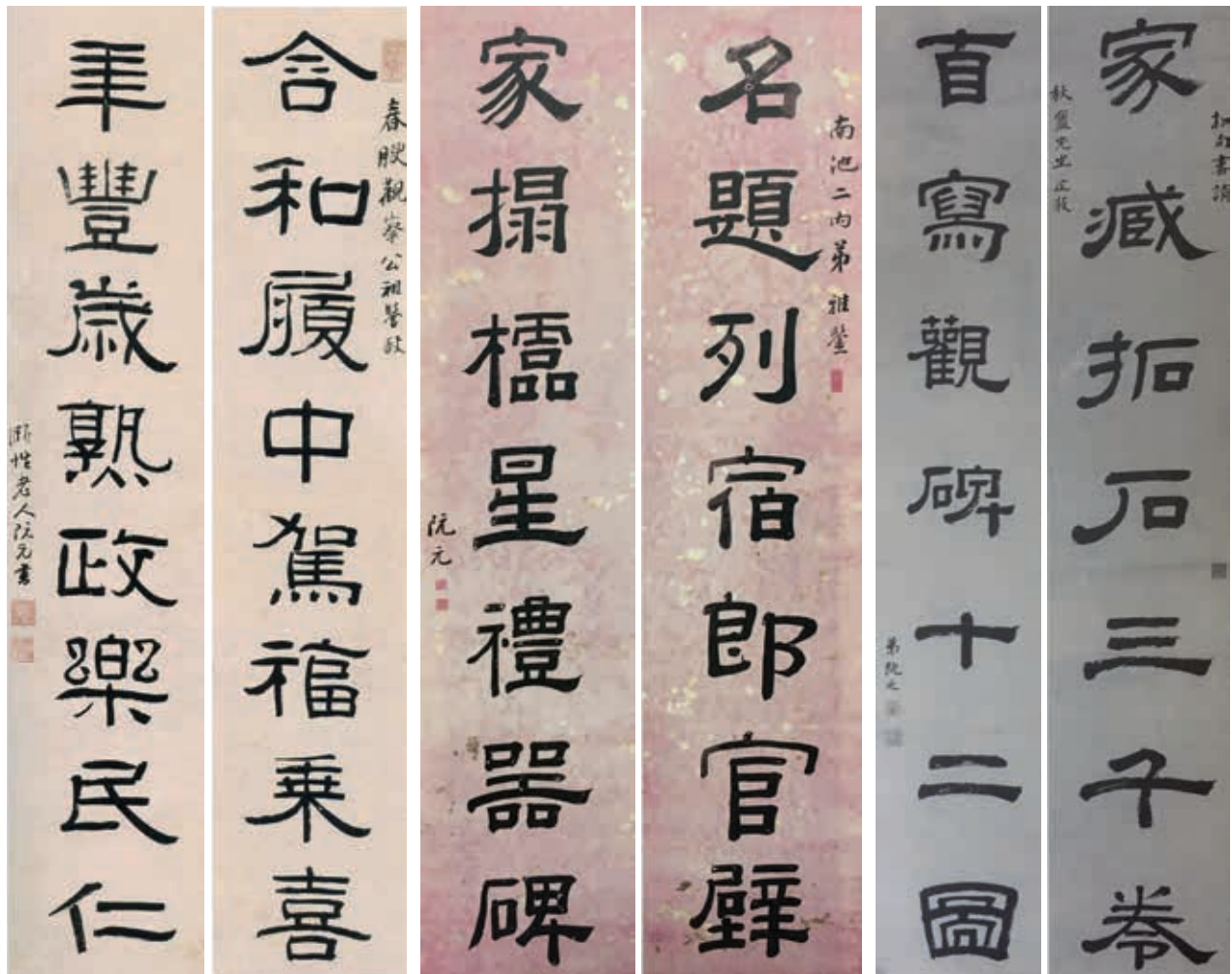


圖9 清 阮元 隸書八言聯 山西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17·清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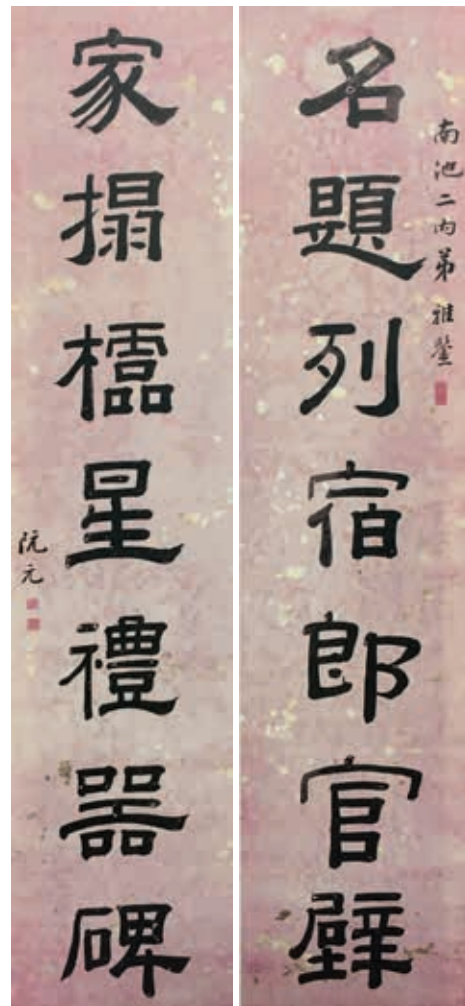


圖8 清 阮元 隸書七言聯 山東博物館藏 引自揚州博物館編，《大雅芸臺—紀念阮元誕辰250週年文物聯展》，揚州：廣陵書社，2015，頁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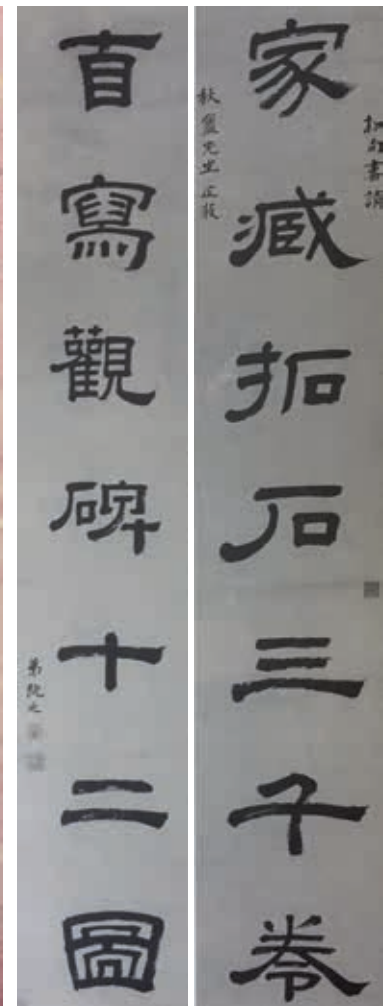


圖7 清 阮元 隸書三言聯 引自啟功、村上三島圖版監修，文物出版社編，《中國真蹟大觀·清》，京都：同朋舍，1995，頁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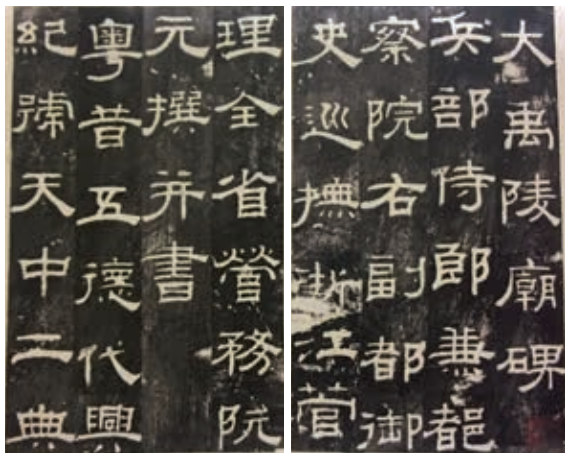


圖6 清 《大禹陵廟碑》拓本 南京圖書館藏 引自金丹，《阮元書學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2。



圖5 清 阮元 隸書七言聯 揚州博物館藏 引自揚州博物館編，《大雅芸臺—紀念阮元誕辰250週年文物聯展》，揚州：廣陵書社，2015，頁37。

夠信心（註六），亦認為錢泳之端莊精雅的書風更為符合自己封疆儒臣身份的需要，故而才有諸如《大禹陵廟碑》這類代筆現象的出現。因此，目前可見的一些署名阮元，但結體用筆之精熟程度超過阮元其它作品的隸書，應予以謹慎對待，不可驟

而現存阮元六十歲之後的隸書作品則多有這十數年間的隸書書寫有著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體勢從拘謹變為開張，對於漢隸風格更加熟稔，因而在筆致上也更加輕鬆自信，但總體來說，它們都是工穩之作。

然視之為阮元此時的隸書水平，如刻石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現存山東濟南鐵公祠的《小滄浪亭雅集詩序》便很可能是代筆或經人「潤色」過的。

鈐有「文淵閣直閣事」之印的「白沙翠竹霜筠古，黃海蒼松壽節高」一聯及鈐有「詔勘石經」之印、書贈黃易的「家藏拓石三千卷，自寫觀碑十二圖」一聯（圖七）為阮元三十歲前後之作。鈐有「文選樓」、「雷塘庵主」兩印的「名題列宿郎官壁，家搨橋星禮器碑」一聯（圖八）為阮元四十三歲或之後所作，不會晚於六十歲。（註七）通過對比，可以看出，阮元在

率意之筆出現，如圖三一聯（鈐印「節性齋」）（註八），此時阮元於隸書已有自己的心得，結體上更加自由，用筆亦不拘小節，筆力較之前更加沉穩。阮元八十歲後之作多有明顯的石門頌風格，線條波折生動自然，融率意與規範於一體。（圖九）有鑒於此，因而有學者以為：「阮元早期的隸書風格……在《史晨》、《乙瑛》之間……而到晚年，由於目力甚衰，故發生了變化，他難以用那種嚴整工整的風格完成創作，而更傾向於《石門頌》一類的風格，自由、輕鬆、率意、質樸。」（註九）

阮元是否純因目力原因而導致了由工整走向率意暫且不談，但是阮元前後期之隸書風格有一個從工整到率意的階段是大體不差的。然而，這是否意味著阮元前期便沒有率意風格的嘗試呢？「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一聯的存在，或可解答這一問題。

書寫與場合

在清代，書法並不完全由書寫者的個人藝術理念來支配。由於書寫在不同場合所承載的不同禮儀、情感、實用功能，同

一個人的書寫面貌會呈現不同的變化。對於阮元這樣一個封疆大吏來說更是如此，他的許多書法作品與他的官員身份和人際網絡聯繫在一起，雖是隻字片楮，在「書為心畫」的傳統觀念支配下，書法作品的觀看對象也期待著從中看出與他的身份、學問、品行相匹配的筆墨品質。這也是為何阮元會令隸書水平高於他的錢泳代筆的原因。即使在應當親自動筆書寫的一些應酬場合，應酬對象的不同也要求書寫者拿出不同的態度，展現出不同的書寫形象。

阮元為人穩重，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一直小心謹慎，他奉詔而作的圖二與圖四兩件書法自然要力求工整端莊，與當時其他大臣奉詔書寫的同類作品保持同一風格。圖五是祝壽之聯，款識為「恭祝江母金太夫人節壽，愚表侄阮元頓首」，鈐有「文淵閣直閣事」之印表明官職，其書寫之周到工穩亦符合他此時三十歲上下向長輩祝壽時所應有的謙恭莊敬。圖八之聯書於阮元中年，上款為「南池二內弟雅鑒」，此人為阮元繼室孔璐華（一七七七—一八三二）之二弟孔慶鑾（生卒不詳），而孔璐華的大弟孔慶鎔（一七八七—一八四一）襲封衍聖公，因此這並非普通親戚之間的筆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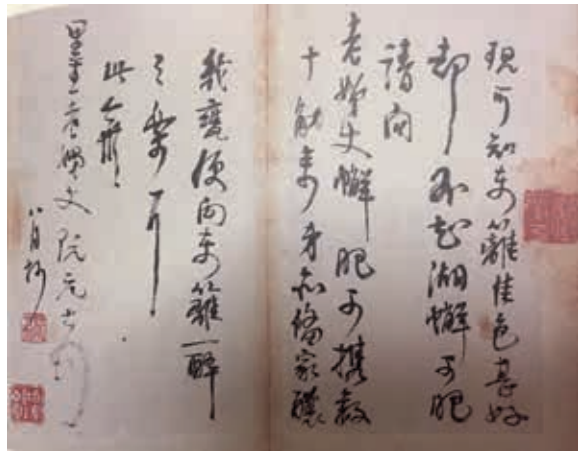


圖10 清 阮元 致焦循信札 雲南省博物館藏 引自揚州博物館編，《大雅芸臺——紀念阮元誕辰250週年文物聯展》，揚州：廣陵書社，2015，頁91。

應酬，而是一份與衍聖公府聯絡情誼的禮物，這一點從「名題列宿即官壁，家榻極星禮器碑」的聯文內容也可看出。這幅以頂級文化家族核心成員為贈送對象的對聯作品，自然需要阮元的審慎對待，故而他精心書寫，無一懈筆。

反觀圖七一聯，這是阮元贈送給著名金石家黃易（一七四四—一八〇二）的書法作品，由聯文內容「家藏拓石三千卷，自寫觀碑十二圖」、「鈐印「臣元」、「詔勘石經」並聯繫阮元的生平經歷可推斷出，

亦用敗筆淡墨塗抹，乾濕不均，而極有生氣。」（註十二）此外，他對於使用「秃筆」的書法也有特別關注。《石渠隨筆》中對於書法進行品評讚揚的文字，遠不如敘述源流、考訂真偽的文字多，可見阮元對於這種「乾筆」、「敗筆」、「秃筆」（註十二）所造成的筆墨意趣極為欣賞，由此可見，嚴謹端莊、工整規矩的書法風格並非他所激賞的對象。

阮元督學山東之後，親自訪碑並與當地學人密切互動、探討金石，從阮元的《小滄浪筆談》及其它材料可知，他不僅關注《乙瑛》、《禮器》、《史晨》等具有廟堂氣象的碑刻，更見過《衡方》等古拙一派且剝蝕較多的漢碑，同時，他也關注漢畫像磚上「天斜不工」的隸書。漢碑自由古樸的氣息及筆畫剝蝕所導致的「金石韻味」，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他六十歲之後存世的隸書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確是有意向天真率意的書風靠攏，而同樣的筆墨情調在他的一些金文書法中，亦可看到——這類書法在晚年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自然與他目力不濟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有更多書寫自由有關，隨著年齡及官階地位的提升，需要「莊謹恭敬」、「一

這是阮元三十歲出任山東學政之後，與黃易密切交往時所作之聯。阮元在山東任職之時開始了此生第一次與秦漢碑刻的大規模接觸，在此過程中得益於長他二十歲的黃易良多，兩人的政治身份雖相隔懸殊，而實為金石之友。細觀此聯，其結體雖然依舊工穩，但筆致已略顯輕鬆，如「寫」字上部的四個小橫畫與下部的四點便頗有隨意之致，而「圖」字的線條已經出現用筆自由而顯現的粗細波動變化，只是還沒有「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一聯中的「圖」字表現得那樣明顯。

再看阮元贈給焦循的這幅對聯，此聯結體仍屬緊密，尚未達到晚年那樣開張疏朗的程度，但他對於隸書的結體方式已較為熟悉，因而書寫自如，不復有拘謹之態，從中亦可看出其在臨習漢隸經典上所下的功力。由此可推測，此聯當書於圖七一聯之後。聯中的「經」字與「李」字又含有明顯的篆書意趣，反映出阮元在篆隸皆習的情況下，融篆入隸的一點嘗試。這種隸書中含有篆書結體元素的情況，在翁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及當時其他一些書家的隸書中亦可看到。整幅對聯最突出的便是阮元此時的用筆方式，雖然筆畫的

絲不苟」去書寫的場合大為減少。正如他在《顏魯公爭座位帖跋》中所宣稱的「夫不復以姿媚為念者，其品乃高。」（註十三）因而「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一聯既可說是他晚年書風的先導，亦可說

起止部位基本上遵照了漢隸的法度做出了應有的藏頭、回鋒、雁尾等動作，但在完成時顯然較為隨意，出現了飛白、秃毫等效果，在線條上也未刻意控制其質量，而是任其高低起伏，顯示出對於碑刻風化剝蝕效果的模仿意圖。

以阮元與焦循之親密關係，他書寫此聯自然無需太過端敬，而更可以自由地在筆墨上有所表現。如同阮元給焦循的其它信件一樣（圖十），此聯之輕鬆率意是他們之間親密友情的一種表現。

阮元的書法審美取向

「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一聯的書風是否反映了阮元真正的書藝追求呢？阮元四十八歲時在《南北書派論》中推崇「拘謹拙陋」的北朝碑版，這一審美取向早為世人所熟知，而他早年參與編修《石渠寶笈》時，便已流露出了不尚妍美的傾向。他在《石渠隨筆》中寫道：「林藻深慰帖，墨蹟十八行，紙有縑紋，故乾筆所到之處，皆露白痕，如粗絹孔然，其筆墨濃淡輕重悉見，愈顯其精神魄力」（註十），「米芾尺牘卷……王孟津跋……王跋

是他中年時期在自己的書藝理想下，對於隸書筆墨所作的打破嚴整規矩的嘗試。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生

註釋

1. (唐) 魏徵等，《隋書·卷七十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三，頁一七二〇。
2. 見劉謙輝《焦循年譜》，《焦循評傳》，揚州：廣陵書社，二〇〇五，頁一八七。
3. (清) 阮元，《寧經室集·卷九》，四部叢刊景清道光本，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
4. 「嘉慶五年浙江巡撫阮元公奉命修大禹陵，作記立石，冰為書碑。」見(清) 錢泳，《寫經樓金石目》卷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無頁數。
5. 陶湘輯，《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卷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二十二冊，臺北：臺北明文書局，一九八五，頁二一七。信中未有年款，但依據《焦山仰止軒記》一事，考察阮元年表，可知為嘉慶十二年。
6. 信中雖未明說「不工」的是隸書，但從「橫平豎直」的特徵及阮元一貫因隸書事宜求助於錢泳的慣例來看，此處所論應為隸書。
7. 關於阮元印章及任職履歷，參見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二〇〇三；金丹，《阮元書法金石年表》，《阮元書學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二〇一〇。
8. 阮元啟用「節性齋」之號當在六十歲左右，並自號「節性齋老人」，至八十歲時改號「頤性老人」。相關史料證據參見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二〇〇三，頁九九二。由此印章及對聯之書風推測，此聯應當作於阮元六、七十歲之時。
9. 金丹，《阮元書學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二〇一〇。

參考書目

1. (清)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一。
2. (清) 阮元，《石渠隨筆》，清阮亨揚州珠湖草堂刻本，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
3. (清) 阮元，《寧經室集》，四部叢刊景清道光本，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
4. 金丹，《阮元書學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二〇一〇。
5. 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二〇〇三。
6. 范耕研，《江都焦里堂先生年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二。
7. 劉謙輝，《焦循評傳》，揚州：廣陵書社，二〇〇五。